



●〔目〕忽滑谷快天 著
●朱谦之 译

韩国禅教史



韩国禅教史

〔日〕忽滑谷快天 著
朱谦之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禅教史/(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
ISBN 7-5004-1515-X

I. 韩… II. ①忽…②朱… III. ①禅宗-佛教史-韩国
②佛教史-禅宗-韩国 IV.B949.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0921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2

字数: 400千字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8.00元

序

黄 心 川

佛教是传统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由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公元前3世纪时开始由印度向外传播，约在1世纪左右经由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复由中国再传入韩国、日本、越南等国。

韩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在两国人民交往中，凝成了深厚的友谊。宗教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交流内容之一，特别是佛教作为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已逾1500余年的历史。



中国佛教最早传入高句丽大概在第十七代君主小兽林王二年(372)，当时前秦苻坚曾派使者及僧顺道送去佛经和佛像，小兽林王也遣使者答谢。越2年东晋僧阿道又去高句丽，高句丽王在首都辑安附近的丸都城建省门寺和伊弗兰寺供顺道和阿道居住。晋孝武太元末(396)，白足和尚昙始赍经律数十部经往辽东弘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平原王十八年(576)，大丞相高德派遣沙门义渊入中国北齐都城邺(今河南临彰县西)向定国寺和尚法上询问佛教的缘由。宋末齐初，高句丽僧道朗由辽东至江南，从

昙庆学三论，在摄山嗣法于黄龙（今吉林地区）法度，学习《华严》等经义。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遣僧正智寂、僧怀、惠令等10人诣摄山从僧朗学习三论、《华严》，武帝还根据僧朗的义解作章疏。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稍晚于高句丽。枕流王元年（384），梵僧摩罗难陀由东晋到达百济的汉山城，受到百济王的热诚接待，翌年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此后佛教在百济日益兴盛，“僧尼寺塔甚多”。在中朝交通的门户——泰安丰岛的瑞山和唐津的西海岸建有泰安摩崖伽蓝、云山摩崖伽蓝、百济金刚佛伽蓝和修德寺等等。梁武帝大同七年（541），百济遣使赴梁求《涅槃》等经义并工匠画师。

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的新罗，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衲祇王时（417—418年）由高句丽输入的。在南北朝时，新罗有不少僧人来我国求学巡礼。据不完整统计，自6世纪中叶到7世纪末的150年间，到中国和印度求法的新罗僧共21人，其中去印度的有9人；到中国的著名高僧有玄光、明观、无相、圆光、智明、安舍、慈藏等人。梁武帝太清三年（549），遣使沈瑜并新罗学僧觉德送佛陀舍利至新罗，新罗真兴王奉迎于兴轮寺。陈文帝于天嘉六年（565），遣使刘思及留学僧明观至新罗送佛教经论2700余卷，新罗的经籍臻于完备。

二

6世纪末至1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代。佛教在隋唐统治阶级的扶持下，走上了兴盛的道路，完成了外来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先后出现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和禅宗等

佛教宗派，同时也对其它邻近国家的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正是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而又统一时期。7世纪中叶，新罗联合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王朝的建立，对内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各项政治措施，完备了九州（地方最大的行政区域）、五京（特殊的行政区域）和郡县制，加强了对各级地方官吏的监督，在经济上采取奖励生产的各项措施，大兴水利，提高耕作技术，铸兵器为农器，实行丁田制（按丁男、丁女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因之出现了“家给人民，民间安堵，域内无虞，仓廩积于丘山”的局面。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安定，文化艺术也随之出现了繁荣景象，为朝鲜古代文化奠定了基础。新罗政权还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文化，最多的一次曾达100余人。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的需要，一方面大力扶植儒教的势力，另一方面又支持佛教、道教的发展。随着新罗佛教的繁荣，国家陆续派出了不少僧侣来中国求法和巡礼，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新罗时期来华僧达117人。他们在华广参名山诸者，参预译场活动，著书立说，回国时携去大量的佛教经籍和文物，继续从事佛教经论的宣传和研究，或开山授徒，在国内建立了具有新罗民族特点的佛教宗派或学派，与中国唐朝鼎盛期的佛教相互呼应。

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学派或宗派除地论、毗昙少数派别外，大多数都先后传入了韩国，形成了“五教九山”之说。五教是五种佛教宗派，它们是：

一、**涅槃宗** 主要依据《涅槃经》经义所建立的。由新罗武烈王时期（654—660年）的普德和尚开创。对《涅槃经》有研究成就的学者有元晓、义湘、憬兴、义寂、大贤等人。涅槃宗有八大伽兰，根本道场是景福寺，创始人普德和尚，有无上、金趣等高足。

二、律宗 善德女王时代（632—646年）由慈藏创建于梁州通度寺，曾设坛施戒。慈藏于636年率弟子僧实等入唐，在终南山云际寺学南山律，回国后任大僧统，在芬皇寺开讲《菩萨戒本》，整顿和修订了朝鲜僧尼戒律。

三、华严宗 有二个派别。一为义湘所传的中国华严宗思想体系的浮石宗；另一为元晓独自开创的海东宗。前者以浮石寺为中心，宣传智俨、法藏的思想，曾有弟子三千，湘门十德；后者以阐扬元晓的《华严经疏》、《大乘起信论疏》为宗旨，以《十门和诤论》调和百家的争论。

四、法相宗 由真表律师于8世纪中叶在金山寺创建。承玄奘——圆测——道证——憬兴——大贤的法统。圆测终身留在中国，传印度唯识宗安慧一系的学说。其弟子道证作《摄大乘论世亲论疏》进一步发挥其师的思想。以后憬兴作《成唯识论义记》、《瑜伽论疏》，顺憬作《成唯识论科简》等，为新罗法相宗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法性宗 以弘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宗旨，阐述诸法实性之义。东晋僧阿道、顺道及高句丽僧昙始曾传播“三论”思想。梁末隋初高句丽的实法师和印法师大力弘扬三论。新罗统一三国后，元晓曾著《三论宗要》、《广百论宗要》等，继续阐述法相学说，但不久即衰微。

此外，除上述五宗之外，还有一些小宗派一度传承。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明朗建立的神印宗传杂部密法；惠通建立的总持宗传唐善无畏的印诀，以后又有明晓、惠日、慧超等人传唐金刚智、不空等人的密法。属于小乘佛教的成实、俱舍学派也很早传入到朝鲜半岛。

九山是指新罗时期佛教禅宗的九个派别。据说新罗僧法朗曾到中国从禅宗四祖道信受法，回国后传法于弟子神行，以后神行

又来华学习北宗禅。不久，新罗僧道义入唐从马祖道一弟子西堂智藏学习惠能的南宗禅，回国后从事于南宗禅的弘化，又经来唐学习的新罗僧慧昭、无染、慧日、道元、玄晃等禅门宗徒的阐扬，南宗禅成为新罗禅宗的主流，形成了实相、迦智、闍崛、桐里、圣住、师子、曦阳、凤林及高丽初期建立的须弥山的“禅门九山”。

新罗王朝末期，由于统治阶级加深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压迫及剥削，中央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自宣德王（780—785年）即位至新罗最后敬师王（927—935年）的150年间，王室内部为了争夺帝座，进行了血腥的残杀，先后有20个国王象走马灯一样登上王位。佛教在这个时期虽然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上还有重要的影响，但前一个时期的具有思辨色彩的、为贵族所信奉的“教学佛教”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佛教内部出现了两种新的潮流：一是注意实践方法的禅宗，这个派别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二是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崇拜阿弥陀佛、观音和弥勒的净土信仰，此外还出现了把佛教功德报应思想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学说相结合的“祈福佛教”，使佛教更趋向民间化和神秘化。大约在9世纪初，禅宗在新罗崛起，逐渐压倒其它宗派，成为后来各朝佛教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三

10世纪初，原为新罗大臣的王建建立高丽王朝，取代了原有的新罗王朝。高丽王朝存在了400余年，历代诸王都笃信佛教，热衷于佛事。高丽太祖以护法者自居，即位后大兴佛寺，礼待僧侣，开办法会，国内佛教气氛隆盛，临终时遗言强调要护持佛法。后出的很多王室人员竞相出家，甚至朝廷后来规定多子家庭必须送一个儿子到寺庙出家的制度，推动了社会上崇佛的热潮。高丽时

代，朝廷还实行了选拔僧侣的僧科考试制度，参加考试的僧人先在寺庙里进行预考，及格后再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凡考试及格者可以获得官方授予的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首座、大禅师、僧统等各种僧职，有的甚至被奉为王师或国师。管理僧人的僧官制度也在此时完备起来，以僧录司来管理僧界的活动。11世纪初从显宗经德宗、靖宗至文宗几十年时间，朝廷雕刻了高丽藏经1106部，5048卷。高宗十九年（1232）藏经雕板被入侵蒙古士兵焚毁，于是又于1236年倾尽国力重新雕刻，1251年再次雕成，雕板至今仍然保存在海印寺内。

高丽佛教界内部主要形成了禅宗和教宗两大系统。前者以九山禅门为主，各山竞立，互相演运，一时高僧大德各领风骚。以后天台宗兴起，禅门一度受挫，不久又重新恢复。学一、坦然等人开创了曹溪宗，知讷改为曹溪禅社，提倡顿悟的修禅法。禅宗中兴，禅风大化，许多禅宗僧侣被封为国师，受到帝王的礼待。至高丽末期，被称为“禅宗巨匠”的普愚和慧勤大力弘扬，曹溪一宗在诸宗派中独占鳌头。

教宗是指除禅宗以外的其它佛教宗派，^①如华严宗、瑜伽宗、天台宗等。这些宗派在理论上有自己的特色，带有学派的特点，不同于禅宗直指人心的顿悟法门特色实践。华严宗经新罗时期义湘的阐发后，到高丽时形成了北岳、南岳两家，培养了不少精研华严理论的大家，尤以法印国师坦文最突出。瑜伽宗宣传万法唯识的学说，有些宗徒成为王师，曾向国王讲说唯识教义。这一派后来又被称为慈恩宗，在高丽时代曾几度沉寂和复出。

① 一些韩国学者认为高丽前期教宗所属的华严、瑜伽等虽已形成宗派的形态，但全然看不到明确的宗名，该用宗名的时候是用的业，如华严业、瑜伽业等。参见《韩国佛教史概说》，第93页，金模泰著，柳雪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高丽佛教最突出的表现还有义天开创的天台宗。义天是文宗王之子，幼时出家受学华严，后到中国求学，回国后建立了天台宗，弘传天台教观。他还在高丽建立了仿中国建制的国清寺，在各地开设了六大本山，一时学者辐凑，众徒云集。天台宗自义天之后，在高丽一直兴盛。

佛教在高丽发生巨大的影响，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弊病。大兴寺塔和名目众多的佛事活动势必耗费国库的大量钱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又刺激了一些人为逃避劳役和想摆脱现实诸种苦难而纷纷遁入空门，僧伽虽然壮大可观，但僧人的素质却未能相应提高，佛教徒的成份十分混杂，参差不齐。片面追求禳灾祈福成为佛教界的日常主要活动。因之社会上抨击佛教，反佛的呼声日益高涨，佛教成为众矢之的。

四

14世纪末高丽武臣李成桂拥兵自重，废黜高丽恭让王，建立了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曾受到高丽王朝崇佛的影响，对佛教采取了扶植的政策，生前曾封僧人为王师，在宫中斋僧，举办法事，雕刻经板，兴建佛寺等活动。但是由于佛教在社会上曾有一些不良影响，排佛的呼声仍然不断，太祖崇佛的措施并未能挽救佛教下颓的趋势。到太宗继位后，朝廷实行了尊儒抑佛的措施，淘汰僧侣，限制寺院奴婢的数量，削减寺刹总数等。以后多数帝王都遵循了太宗的抑佛政策，如世宗废除僧录司制度，将诸宗并为禅教两宗，文宗禁止百姓出家，僧尼不得进入都城等等。其间虽有个别帝王或太妃有兴佛之举，但没能挽救佛教的下滑趋势。

由于受到了政府的打击，在佛教界内部很多教团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诸山各自分立，仅依靠师资脉脉相承的制度得以保存

下来。僧侣因不得进入都城，只能在山林中栖隐，影响十分有限，韩国的佛教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佛教概括为“山僧时代的佛教”。其间，虽然有一些高僧做过复兴佛教的种种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主要限制在民间范围。佛教界为了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向朝廷呼吁放宽政策，另一方面进行自我调整，振作僧侣纪纲，创立僧风纠察机构，力图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佛教的教学也转向禅教结合、儒释融汇的道路，禅宗成为当时佛教最有势力的僧团之一。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朝鲜佛教虽然已不可能和百济、新罗、高丽等期的佛教盛世相比，但是它在民间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央政权尽管对它采取了严格的控制和限制政策，然而各地的地方政权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并没有认真地贯彻，于是造成了佛教在京城影响不大，在地方和民间仍有潜在的力量。

朝鲜王朝时期正值日本大举入侵之际，佛教僧侣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僧人灵圭曾组织义僧军，拿起简陋的竹枪、镰刀率兵勤王，打退了重围的倭寇。灵圭率800僧家弟子在与倭寇的战斗中，表现十分勇敢，最后全部以身殉国，谱写了一曲佛教僧人爱国抗争、反对外侵的赞歌，受到了人们的敬仰。这一时期参加反对倭寇的佛教义僧达5000人，73岁的西山大师为僧军的首领，他们挽救了国家。由于佛教僧侣在抗倭救国斗争表现非凡，改变了朝廷和世人对佛教的看法，在朝鲜王朝末期，佛教有所恢复。

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韩国的佛教再度复兴。光武元年（1897）朝廷正式解除禁止僧侣入城的禁令，设置了管理佛教的专门机构——管理署，随后发布《国内寺刹现行细则》36条，规定了佛教的义务、僧阶的认定、僧衣的颜色、寺刹的等级、僧官的职责等等。韩国的佛教在政府的管理下，以汉城的元兴寺作为总宗所，在各道内设首寺一个，佛教以元兴寺为中心再次发展

起来。1904年管理署被撤销，佛教归地方当局管辖。2年后僧侣们又成立了佛教研究会、圆宗宗务院等团体。

五

1910年韩国被日本正式吞并。翌年日本总督重新颁布寺刹令，将朝鲜佛教分为30个本山或教区，规定寺刹的变更、合并等需经总督的认可。寺刹的土地、森林、佛像、文物、字画等要得到总督的许可，才可以处理。管理寺庙的住持等人也要经朝鲜总督的批准，总之朝鲜的佛教完全被日本当局所控制。殖民地的朝鲜佛教为了争取自立，始终存在着反对日本利用佛教殖民的活动。1910年朝鲜僧人为了反对日本曹洞宗对圆宗的控制和结盟，组成了否定圆宗的运动，倡议成立朝鲜的临济宗组织。1922年一些朝鲜僧人为了护教自救，在觉皇寺设立朝鲜佛教祥教两宗中央教务院。1925年又成立了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越3年召开朝鲜佛教祥教二宗僧侣大会。1941年朝鲜僧伽以太古寺为总本山，定名为统一的曹溪宗，全国僧侣在曹溪宗的旗帜下希望走上统一的道路。

与此同时，朝鲜的佛教教育也有了新的起色。佛教界曾创办了不少佛教学校、佛教私塾和杂志报刊等等，致力于培养佛教人材，扩大佛教影响。另外，一些与佛教有关的新兴宗教组织也相继推出，比较重要的有圆佛教、龙华宗、弥勒宗等。有的新兴宗教还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镇压，被迫解散。

六

1945年日本投降，韩国获得解放。不久全国分为二部份，北方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方是大韩民国。北朝鲜的佛教

界曾于1945年成立了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宪法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近年来北朝鲜的佛教活动有所加强，1986年佛教徒联盟加入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组织。

韩国的佛教在战后发展比较迅速。1945年10月召开了全国僧侣大会，废除了殖民地时期的寺刹令和有关佛教法令，重新制订了新的佛教法，成立了“韩国佛教总务院”。政府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保护信仰自由。1954年成立“韩国佛教信徒会”和“曹溪宗全国信徒会”。以后又成立了“韩国佛教青年组织”、“全韩国青年会”等。过去韩国佛教因受日本佛教某些派别的影响，有的教派仿照日本某些教派的做法，允许僧人娶妻食肉。独立后，曹溪宗内部一些人要求将此派僧人逐出教团，不承认他们的出家人身分。两派斗争了7、8年，最后双方各自成立了总务院。1970年蓄发带妻一派正式从曹溪宗分出，成立了太古宗。韩国的佛教不仅在民间拥有广泛影响，还渗透到军队里面。1968年军内增设军人僧侣，军僧和士兵组成了法友会佛教徒组织。1976年政府把佛诞定为国家节日，保护佛教界的活动。1979年韩国影视界拍摄了高丽藏雕板的故事《八万大藏经》电影，评论家认为这是“（韩国）电影史上的最大杰作”。现在韩国的佛教十分盛行，有全国性的“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佛教宗派有：曹溪宗、太古宗、真觉宗、佛入宗、元晓宗、普门宗、华严宗、总和宗、一乘宗、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大乘宗、法华宗、法相宗、法轮宗、圆融宗、本院宗、三论宗、曹洞宗、弥勒宗、弥陀宗、如来宗、涅槃宗、教宗、念佛宗、观音宗等。在教理上，有所革新或融合各家教义。韩国的佛教大学有曹溪宗的东国大学、圆佛教的圆光大学等。佛教在韩国人民的生活中有重要的影响，据有关统计，信仰佛教的韩国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以上，是全国宗教徒的50%，达1300余万人。

七

韩国的佛教自传入至今已有 1500 余年的历史，佛教早已成为韩国的传统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佛教对韩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在韩国宗教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韩国的佛教是自中国传入的，从历史上看，到韩国被日本吞并以前为止的一千余年里，韩国佛教在其总的发展势态上都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中国隋唐鼎盛期的佛教促成了新罗佛教的广泛流行。宋明佛教的教禅合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使高丽、朝鲜佛教出现了各教会通的情况。以后禅宗在中国成为佛教主流，在韩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韩国佛教史上的盛衰消长，往往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干预结果，这一点在中国佛教史上亦是如此，说明在东亚专制封建国家，佛教的发展与统治权力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佛教对韩国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宗教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运动，韩国的佛教同样对中国的佛教也产生过影响。新罗僧元晓所著的《华严经疏》与《大乘起信论疏》（海东疏）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产生过强烈影响，法藏在其所著的《起信论义记》中一再援引元晓的疏解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另外，元晓的注疏也深刻影响了华严宗四祖澄观所作的《华严经疏》。元晓所著的“二障义”与法藏在《华严五教章》中所述的“断惑义”、元晓倡导的“空有会通”与法藏宣传的“空有交彻”思想都是前后一贯，如出一辙。另一位新罗僧圆测是中国唯识学派别之一的“西明派”理论奠基人。他会通新、旧唯识的思想虽然在中国汉地影响不大，但在韩国落根后，迅速传播至日本，并反过来传至中国藏地，对昙旷和宗喀

巴都有影响。新罗僧顺璟来唐，直接从玄奘学习因明，传得玄奘“真唯识量”，复立“决定相违不定量”，窥基闻而感叹说：“新罗顺璟法师者，声振唐蕃，学包大小……海外时称独步，于此量作决定相违”。新罗僧太贤弘传玄奘唯识学，其著书也流入中国。新罗僧地藏渡海来华，在九华山示寂，时人尊之地藏菩萨示现，九华山遂成为地藏道场，列为中国四大名山之一。五代时中国天台宗典籍散佚，大明沙门子麟前往高丽搜求甚丰。吴越王钱俶专门派遣使节到高丽索取教典。高丽僧义通来中国天台，学得天台宗旨要，弘扬教观 20 余年，被奉为天台十六祖，发展了中国天台宗教学。元世祖欲刻写藏经，延请善于书写金字经典的高丽写经僧 100 人至元都写经。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过去一些中国和日本出版的韩国佛教书籍中，曾有人认为韩国的佛教宗派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延长”或“移植”。这种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韩国的佛教虽然取自于中国，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了韩国社会斗争的需要，因之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例如陈末隋初来华求法的高僧圆光回国后大力宣传佛教的“三归五戒”。他把佛教的世俗五戒解释为：“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这种解释是和中国、印度佛教一贯主张的“不杀”、“无害”精神相对立的，这明显地是要为新罗诸王统一高句丽和百济的军事行动辩护，为国民树立一个道德伦理的标准。又如被称为“八宗之祖”的元晓，在其所撰的大量注释中充分表露了朝鲜半岛佛教的特点。他提倡“归一心源说”，力图调和“百家之异争”，从和诤论的立场出发，不单对朝鲜的宗派和学说，而且也对中国的各种佛教理论进行了科判，讥笑中国天台宗大师智顗的“五时八教”是“以螺酌海，用管窥天”，而元晓的佛学思想也受到中国华严宗正

统派的批判，静法苑公把他的疏解视作“毒树生庭，不可不伐”。但是元晓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宗教解释，他的超越一切的论证方式、相对的认识理论、会通圆融的立场、象征主义的仪式，对后世朝鲜半岛的佛教发展一直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些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来的宗教和文化要在异国落根，必须要和当地的现实社会情况和历史传统相结合，否则将不能得到立足发展。

朝鲜半岛的佛教属于北传大乘佛教文化圈中的一环，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另外几个国家是中国、日本和越南。朝鲜半岛的佛教不仅对中国佛教有过影响，对日本的佛教也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许多日本僧人往往取道朝鲜半岛，经中国东北地区到内地学习佛教，也有新罗、高丽僧人到日本弘法，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所以，在中、日、韩三国组成的东亚佛教文化圈中，韩国的佛教既处于中介的地位，是中国佛教向外传播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又是会通中日佛教的结合点。今天我们来研究朝鲜半岛佛教时，应该充分正视这一史实，看到它曾在历史上起过的重要作用。

八

《韩国禅教史》是日本近代著名佛教学者忽滑谷快天晚年撰写的一部佛教著作。忽滑谷快天于1867年出生于东京。1884年入曹洞宗大学（现名驹泽大学）学习。1887年毕业后受法于善长寺住持忽滑谷亮童。1888年就学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891年入庆应义塾大学。1893年毕业，获文学博士。以后在曹洞宗高等学校、曹洞宗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同志社等处任教。1991年受曹洞宗当局的委托，赴欧美等地考察，做学术研究。1925年曹洞宗大学改名驹泽大学，忽滑谷快天出任校长。他自幼受曹洞宗的传统教育，

通晓汉语、英语，一生着重于禅的研究，曾用日文和英文撰写了不少佛教著作：有《禅学新论》、《禅学批判论》、《禅学讲话》、《禅之妙用》、《参禅道话》、《达磨和阳明》、《清新禅话》、《和汉名士参禅集》、《乐天生活之妙味》、《禅家龟鉴讲话》、《养气炼心之实验》、《禅的理想和人生的曙光》、《信仰和民力》、《禅学提纲》、《禅的信仰》、《普劝坐禅仪讲话》、《禅学思想史》等等。1934年逝世。

忽滑谷快天在日本佛学研究中属于旧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方法表现了日本学术界的特点，即以搜集丰富资料和细致校勘整理为特长。他的著作一直被治佛教的学者学习、引用，现在许多中国出版的禅学著作中所列的参考书目里都列有他的代表作之一《禅学思想史》。不少中国的读者对外国的禅学大师常常知道铃木大拙和弗洛姆等人，实际上他们的著作也都参考或引用了忽滑谷快天的著作，就此而言，忽滑谷快天在学术界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韩国禅教史》于1930年出版。全书32万余字，共四编。中心内容是叙述禅宗和教宗两家在朝鲜半岛的演变和发展过程。纵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资料丰富 本书主要以资料性见长，作者搜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材料，有原始的佛教资料、碑刻铭文、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汉文撰写的佛教资料，包括中国的史书。

二、历史时限长 全书讲述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入和发展，始于从佛教传入的高句丽一直到日本侵入韩国，吞并韩国时为止，上下时限共1500余年，是一本通史性的著作。

三、重点突出，脉络清楚 此书以历史为经，人物为纬，突出各个不同时期的佛教事件和重点人物。每一编之前都有一个简